



欧阳修像

故宫的书法风流②

环滁皆山也……

欧阳修被贬到滁州，涉嫌“生活作风”问题。宋代多贬官，我想与“台谏”制度有关，因为御史台、知谏院，这一“台”一“谏”，就是用来监督和牵制行政官员权力的，免使“重文抑武”的宋朝出现相权专制。笔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写过，晏殊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等，都曾做过谏官，欧阳修还是著名的“四谏”之一。

欧阳修的醉与醒(一)

□祝勇

力主新政 被借故贬谪

但“屁股”决定脑袋，一旦“台谏”官员进入行政团队(范仲淹曾任右司谏，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，发起“庆历新政”)，就知道了台谏官员手起刀落、用文字“杀”人的厉害。来自他们的“批判”火力，常让行政官员畏首畏尾，如临大敌。因此，一方面，宋代“台谏制度”可以制约权力；另一方面，又使宋代政治以求稳为主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稍有不慎就会受到贬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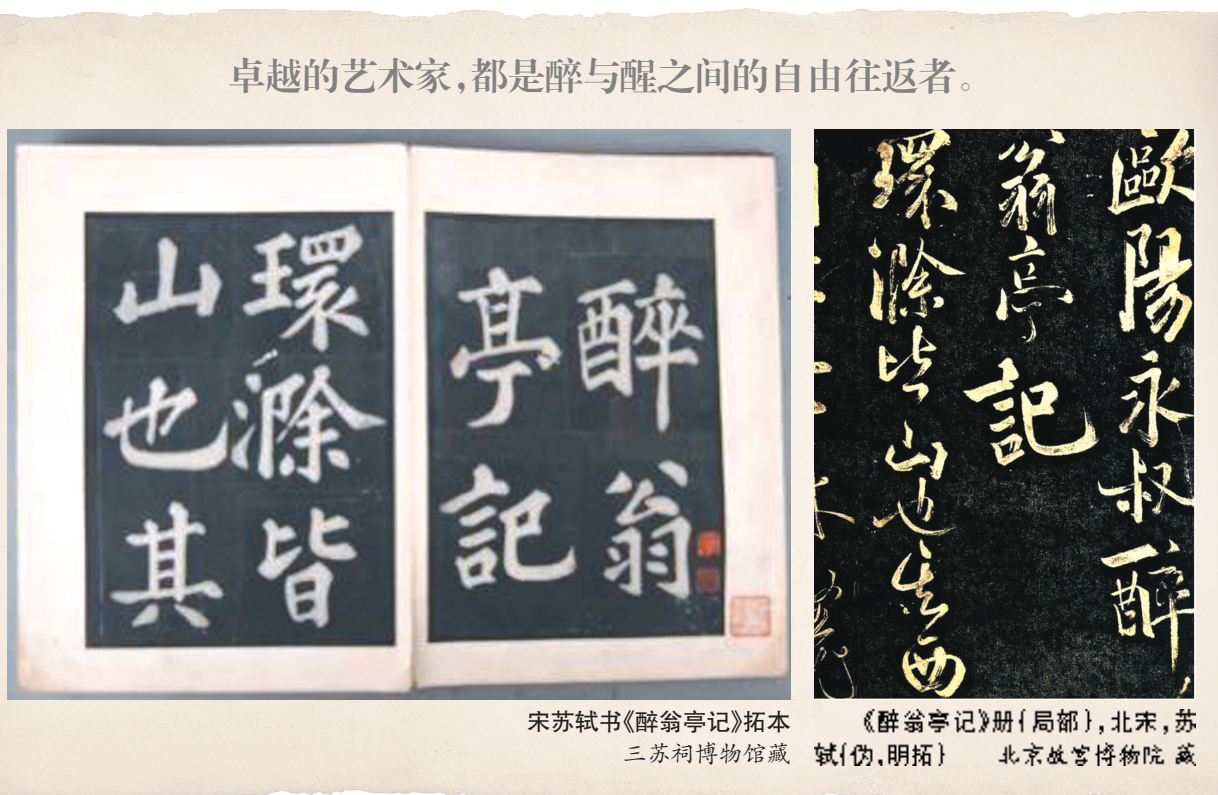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是宋代政治积弊难改的原因之一，所谓成也“台谏”，败也“台谏”。近读吴钩先生《宋仁宗——共治时代》一书，见有这样一段论述，颇得笔者心：“在庆历年间，即使仁宗与范仲淹想放手一搏，但制度终究会让他们束手束脚。更何况，仁宗并不是一名具有杀伐决断魄力的雄主，相反，他优柔寡断，虽然亲擢范仲淹、富弼等生力军执政，想要‘干一票大的’，但当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时，他又动摇了。庆历新政草草而终，是可以想象的。”

庆历五年(公元1045年)，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四名新政主力纷纷“落马”，被轰出朝廷，“庆历新政”气息奄奄。支持新政的欧阳修，已在劫难逃。但谁也没想到，欧阳修被贬，是因为一则“桃色新闻”。

来说说这段八卦吧。欧阳修有一个妹妹，嫁与襄城张龟正作续弦。不幸张龟正去世，留下欧阳修的妹妹，还有张龟正与前妻所生的七岁女儿张氏，孤苦无依。欧阳修便把她们接到汴京，与自己一家共同生活。十年过去了，张氏长大成人，出落得明眸皓齿、貌美如花——我们姑且称之为张美女吧，于是欧阳修做主，把张美女嫁给了远房堂侄欧阳晟。欧阳修的外甥女(欧阳修妹妹的继女)，这样又成了他的侄媳妇。自她远嫁，相隔千里，音讯杳然。

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，但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，是因为故事里往往潜伏着某些事故，使本已尘埃落定的故事沉渣泛起。庆历五年六七月间，就在朝廷风声鹤唳、新政气息奄奄的敏感时刻，欧阳晟家出事了。他在罢虔州(今江西省赣州市)司户后，携妻子回汴京，随行的男仆生得俊俏，欧阳修的外甥女或曰侄媳妇张美女竟与他私通，被丈夫欧阳晟发现，送交开封府右军巡院处置。刚好开封府尹杨日严与欧阳修有仇(杨曾因贪污渎职被欧阳修弹劾)，逼迫张美女供出在汴京居住时与欧阳修有染，“庆历新政”中曾被欧阳修批评的宰相贾昌朝、陈执中知晓此事，如获至宝，立刻命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与张美女有乱伦之情，而且图谋侵吞张家财产，还拿出欧阳修一首词作“证据”，词是这样写的：

江南柳，
叶小未成荫，
人为丝轻那忍折，
莺嫌枝嫩不胜吟。
留著待春深。



卓越的艺术家人，都是醉与醒之间的自由往返者。

宋苏轼书《醉翁亭记》拓本 三苏祠博物馆藏
《醉翁亭记》册(局部)，北宋，苏轼(伪，明拓)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十四五，
闲抱琵琶寻。
阶上簸钱阶下走，
恁时相见早留心。
何况到如今。

有人说，这首词是后人附会的，但笔者在《全宋词》里找到了这首词，归在欧阳修名下。这首词，原本是描写少女情态的，那么单纯，那么优美，被生拉到案子里，怎么越看越“黄”？

被贬滁州 心境晦暗无比

汉语本身有太强的多义性，而宋词的含蓄凝练，又为人留下了太多的“余白”，一旦得到某种心理暗示，人们就可能顺着暗示走，许多的想象空间会被开启，许多被“遮蔽”的“潜台词”会被瞬间“激活”。

这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比“桃色新闻”更吸引眼球，让人血压升高、肾上腺素飙升。对于“桃色新闻”的反应，古今皆然。

哪怕“桃色新闻”是假的，人们也大多“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”，以小人心度君子之腹——以欧阳修而论，谁能相信面对着窈窕淑女，他会无动于衷呢？

尽管负责监勘此案的宦官张昭明没有认同这些七拼八凑的“证据”，认为欧阳修与张氏所谓私通一事无从证实，但欧阳修还是受这件事的牵连，被解除河北路都转运按察使的职务，贬往滁州担任太守。

庆历五年秋，欧阳修离开镇阳，灰溜溜地赶往滁州贬所。渡汴河时，蓦然抬头，他看见青蓝的天空上，一行南飞的大雁与他同行，于是写下一首诗：

阳城淀里新来雁，
趁伴南飞逐越船。
野岸柳黄霜正白，

五更惊破客愁眠。

“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，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……”(《醉翁亭记》)

欧阳修从帝王之都奔向闭塞荒凉的小城滁州，心情就像帝国的前景一样无比晦暗。此前，范仲淹罢参知政事，知邠州；富弼罢枢密副使，知鄂州；杜衍罢为尚书左丞，知兖州；韩琦罢枢密副使，知扬州。随着欧阳修被贬，虽然一些新政的种子仍在帝国的土地上暗中发芽，但被寄予厚望的“庆历新政”基本上成了秋风落叶，四散飘零，大好形势，毁于一旦。庆历五年的冬天，是他心里最寒冷的冬天。初到滁州，欧阳修的心情怎么也晴朗不起来，那基调就像他过汴河时写在诗里的，“野岸柳黄霜正白，五更惊破客愁眠”。

因祸得福 避居风水宝地

欧阳修被贬的真实原因是他支持新政，却因这样一种道德“恶名”被政治对手收拾，这一定让他感到意外、窝囊、恶心。尽管所谓私通之事被认定子虚乌有，但这样的事，终究说不清道不明，别人不问，他也就没法说，即使说了，恐怕也是“越描越黑”，回应他的，只有“黑暗中的笑声”。直到今天，这段“私生活问题”仍然是史学家们聚讼纷纭的公案。这是他的尴尬处，也是私生活抹黑容易得手的原因。

我们常说恢复名誉，其实名誉是不可恢复的，因为毁誉犹如毁容，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，一旦损毁，再难修复。一切尽在不言中，那不言中，又似乎容纳了无尽的深意。欧阳修被小人包围，被流言所伤，仿佛被成群的蚊虫围攻，“虽微无奈众，惟小难防毒”。一切都在暗地里运行，“在黑暗的时刻出现，在阴晦的角落

聚集”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却能要人死命，纵想反抗，也无从下手，像欧阳修说的：“手足不自救，其能营背腹。”站在荒野上，犹如陷入“无物之阵”，欧阳修心里堵着一口闷气，他一定很想透气，想呐喊，想咆哮，但他的呼喊，很快被旷野吸纳，听不到任何回声。

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他，比如远在江西的曾巩，他相信欧阳修的人格。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信中写道：“至于乘女子之隙，造非常之谤，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，不顾四方人议论，不畏天地鬼神之临己，公然欺诬，骇天下之耳目，令人感愤痛切，废食与寝，不知所为。噫！二公(指欧阳修、蔡襄)之不幸，实疾首感额之民之不幸也！”

曾巩的几行字，让欧阳修在悲凉中感到一丝暖意，却无法改变他的现实处境。他决定逃离那张由流言蜚语编织起来的大网，逃离那些闪烁着某种幸灾乐祸、暧昧的眼神。他愿意去滁州，像他《滁州谢上表》所写：

论议多及于贵权，指目不胜于怨怒。若臣身不黜，则攻者不休，苟令谄巧之愈多，是速倾危于不保。必欲为臣明辩，莫若付于狱官；必欲措臣少安，莫若置之闲处。使其脱风波而远去，避陷阱之危机。虽臣善自为谋，所欲不过如此。

或许，只有远去滁州，才能平息这所有的非议。

所幸，欧阳修去的是滁州，地处长江下游北岸的一座小城。到了那里，他才发现这里竟是阳光明媚、雨水充沛、大地润泽、山峦起伏，滁河及清流河贯通境内，通江达海，让他的目光变得幽远而澄澈，连呼吸都一下子清朗起来。他千里迢迢奔波而来，抵达的，竟然是一块风水宝地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